



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鄂东影视文化论丛

沈嘉达 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东影视文化论丛 / 沈嘉达主编. —北京 : 中国
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043-7302-1

I. ①鄂… II. ①沈… III. ①电影文化—黄冈市—文集
②电视文化—黄冈市—文集 IV. ①J9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0227 号

鄂东影视文化论丛

沈嘉达 主编

策 划 杨 洁 庞 强

责任编辑 任逸超

封面设计 嘉信一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9 (千) 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302-1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沈嘉达

编 委：杜建东 童保红 李育林 黄开宋

张才刚 方拥军 王佑江 汪少明

金洪申 黄贤春 陈 然 冯万红

前 言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影视作品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精神内涵与外在形态成为影像符号表现的主体内容，展示出了现代影视艺术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趋势。地处大别山区域的黄冈，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传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文地理风貌，展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些都为本土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审视近年来的黄冈地区影视作品创作，不论是青春题材、名人题材还是革命题材，亦或是由作家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剧，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域文化印迹，形成了其鲜明的本土化风格。在黄冈师范学院吹响转型发展号角的当下，新闻与传播学院倾力推出《鄂东影视文化论丛》，旨在通过对黄冈独特鲜明的影视文化现象的分析与解读，探寻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影视产业发展与文化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实际上，作为时刻关注黄冈本土影视发展的一群“有心人”，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并深入解析影视作品中的“黄冈印迹”。

其一，在青春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教育神话”的光环。

作为曾经创造过“高考神话”的教育名城，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一直是黄冈城市文化形象中最为闪亮的“名片”。“黄冈中学”成为中国应试教育背景下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至今依然广为各年龄层次的人们所知晓。在近年来黄冈推出的本土影视作品中，《青春派》、《不需要初恋的夏天》、《全城高考》、《守护童年》等电影即以中小学教育作为主要内容，讲述青少年一代青春励志的故事。在影像符号创造的光

影世界中，教育不仅成为这些影片共同的标签，更承载着黄冈人对自己或者外地人对黄冈的文化印象，这就是区域文化资源带来的“光环效应”。

喜剧片《青春派》在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上独得8项提名，最终与《小时代》分享“最佳影片奖”，被影评人称为“年度零差评青春爆笑喜剧”，与《小时代》如潮的“恶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部由湖北黄冈广电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喜剧电影，将“黄冈教育”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符号融入其中：片头字幕出现“湖北黄冈”时，观众中发出会心的笑声，因为“黄冈密卷”曾经伴随着几代人走进高考考场。有媒体记者甚至认为，与同一档期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等同类影片相比，《青春派》“最爆笑最接地气最能唤起共鸣”：前两部影片定位“大学青春”，胜在明星效应；《青春派》则定位“高中青春”，胜在故事讲述。为了将故事的真实性完整地表现出来，导演刘杰在北京某中学“卧底”达14个月，同时选用在校高中生担任主演，希望藉此赢得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与《青春派》将拍摄地点选在北京不同的是，电影《全城高考》的拍摄地选在了黄冈本地，以黄冈中学、黄冈师范学院以及东坡赤壁等作为背景，选取了大量黄冈市区街头实景，配角为在校高中学生，真实再现了“教育名城”的人文风貌。影片展示了4个高三学生及其家长、老师在考场内外的喜怒哀乐，力图在“教育神话”的诞生地黄冈思考中国的教育制度，见证一代青年男女的内心世界。上映后，这部影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列入26部国产电影推介名单。实际上，影片投资方及制作者还希望通过此片将黄冈本地经典的旅游文化景点推介给观众，推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它提供了人们相互理解、交往、参与社会实践的空间。”特定区域的文化，从外在的器物层面到内在的价值层面，不仅是该区域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层次反映，更是得以区隔于其他地区与群体的核心因素。对于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而言，文化选择过程实质上就是寻求社会价值认同的过程，也是其获得受众理解与积极回应的基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黄冈教育相对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有了以此作为影视表现对象的可能性

与经典性；教育类影视作品的有效传播，包括其生产阶段的形象建构与消费阶段的审美感知，时时刻刻都与人们对黄冈教育业已形成的印象密不可分。

其二，在名人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名人文化”的沉淀。

据史料记载，黄冈历代名人有 1600 多位，其中古代 1134 人、近现代 466 人。中华世纪坛收录文化名人 40 位，黄冈一地独占 3 位——毕昇、李时珍、李四光。此外，黄冈还有佛教禅宗四祖、五祖以及黄侃、闻一多、胡风等在各自领域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名人；苏东坡、杜牧、吴承恩、李贽、冯梦龙等历史名人，也在黄冈留下过足迹。这些名人和他们的成就，是黄冈地域文化中最为闪光的亮点；他们的精神与气质，已经融入了城市文化形象的有机整体之中。有了名人文化的深远影响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不仅成为现代影视作品最有价值的对象与题材，更有利于在影视创作者与作为受者的观众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沟通的平台。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影视作品而言，“名人电影”由于有了对人物与故事的初步了解，更容易激发受众观看与探究的热情。

依托名人文化，黄冈所辖县市中新春、黄梅、麻城建成了三个影视基地，并拍摄了电影《大明医圣李时珍》，电视剧《黄梅戏宗师传奇》、《麻姑》、《禅宗》、《布衣毕昇》等，戏曲电影《李时珍》也于 2013 年年底完成后期制作。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名人故事得到了传奇式的演绎，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医圣”李时珍在中国医药文化史上的地位，造就了中药材之乡蕲春；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将地方戏曲从“采茶小戏”发展成“高台大戏”，成就了我国有一个“戏曲之乡”；麻姑、禅宗、毕昇等，也因各自非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黄冈地域文化的内涵。经由影视作品的传播，名人文化的效应凸显，黄冈的地方文化旅游具备了独特的气息。

名人故事演绎成为影视作品，是影视作品生产的常规途径。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而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黄冈本土影视作品的确在名人文化之中找到了值得记录与表现的因素。值得思考的是，黄冈本土影视剧中的名人，并没有脱离区域文化的基本特性，而是尽量在艺术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借助现代影像符号进行故事讲述。

这一策略，符合区域文化对影视艺术的规范性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观众的心理期待。经由现代影像技术手段的呈现与传播，黄冈名人拥有了更加丰富与丰满的形象，观众心目中的虚幻想象也有了具象化可视甚至可感的对象。

由名人故事衍生出来的影视艺术，在黄冈旅游文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规划建设的黄冈名人文化园将收录100位入园人物。对于借势“名人文化”的黄冈影视作品而言，应着重讲好自己的故事。首先，应该讲好“革命领袖故事”。以“大别山”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传播基础，也成为几代人对那一段红色岁月记忆的载体；革命领袖的形象及其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成为人们寻找历史记忆的最佳场所，也是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教育的最佳平台。其次，应该讲好“古代名人故事”。在现代影像世界中“复活”苏东坡、毕昇、李时珍等黄冈古代名人，发挥影视媒介的传播优势，使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成为旅游者心目中的寻梦之地。再次，讲好“宗教人物故事”。利用黄梅五祖寺等名胜古迹，对四祖、五祖的禅宗故事进行考证与完善，演绎出传奇色彩。最后，讲好“戏曲人物故事”。对黄梅戏丰富而又广为认知的故事加以改编，挖掘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戏曲人物及其故事，使“黄梅戏之乡”以更加鲜活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三，在革命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红色文化”的记忆。

与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一样，大别山同样是主旋律电影最为热衷的题材。气势恢宏的红色经典《大转折——挺进大别山》、《风雪大别山》、《杜鹃花飞》、《剿匪大别山》等，让观影者对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山川人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9年，由黄冈广电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与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电影《黎明行动》，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全国市州广电部门唯一获奖单位。2013年，《铁血红安》、《大别山红军》等黄冈本土影视作品也已陆续在黄冈本地投入拍摄。浓郁深厚的革命情怀，加之别具一格的人文风情，使得大别山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既有一般战争题材的恢弘与激荡，也具备了大别山区域独有的人文底蕴，这些都为黄冈本土影视作品获得现代观众的广泛认同与情感共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与以井冈山、延安为背景的革命题材影视剧相比较而言，大别山系列电影独特魅力的显现源于其特殊历史阶段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革命故事的讲述。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的摇篮，也是解放战争刘邓大军纵横驰骋的疆场，曾经走出了 300 多位开国将军，留下了不可计数的革命故事。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亮剑》，就在麻城、红安乃至全国观众的推动下掀起一阵“寻找李云龙原型”的热潮，许多人还就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与文献史料的考证。即便是后来得出的答案各有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艺术化创造能够在观众心目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恰好印证了这一段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人们津津乐道的《大转折——挺进大别山》等电影，则将“刘邓大军”与“大别山水”共同载入了史册。

以大别山为背景的红色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除了历史的积淀与涤荡之外，更有其悠久独特的人文环境。在由黄冈本土作家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中，这种源自乡土的气息与革命故事有机融合到了一起，展示出人性与山水相协调的独特美感。2011 年，由黄冈作家何存中的中篇小说《门前一棵槐》改编的电视剧《红槐花》在各大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飘红；他的另一部作品《太阳最红》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有研究者曾对小说《太阳最红》极具乡土文化色彩的叙事风格做过评述：“充满诗意的乡村图景、原汁原味的乡风民俗以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间语言……对乡土的记忆与摹写，使何存中的战争小说《太阳最红》有了走向心灵最为直接的通道，将人性的质朴与战争的残酷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源于文化深处的影像表现手法，虽非黄冈本土电影电视作品的独创，却成就了其与众不同之处。

革命题材影视作品的传播，同样为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黄冈在 2005 年即被国家列为全国 12 大红色旅游区之一，红安、麻城、罗田、英山四处革命烈士陵园被列为全国 100 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在影视传播的影响与推动下，“将军县”红安专门投资建设的“将军影视城”，既是战争类影视作品的外景地，也成为新兴的红色文化旅游基地。这种由影视传播引发的旅游行为，即学界通称的“影视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观众对那段红色历史的共同记忆；影视作品

的广泛传播，则利用影像符号的感召力激发了旅游者探寻故事发生地或者外景地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依然是根本与源头。

神奇的鄂东大地，为影像世界增添了值得回味的经典元素。拥有丰富文化传承与人文景观的黄冈，应充分利用影视媒介的传播特性与影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手段的有机结合，挖掘更为丰富也更具内涵的区域文化资源。《鄂东影视文化论丛》的成书，是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一步，我们将沿着“研究地方文化现象、传播地方文化精神、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一步步将学术活动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影视传播与湖北作家的话语选择	张才刚 / 1
影视传播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 ——以麻城市为例	丁敏玲 / 10
影视传播与黄冈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	杜建东 / 18
“体验经济”时代区域影视旅游发展的策略思考 ——以黄冈市为例	张 莹 / 27
大别山红色文化旅游媒介传播生态解读	李 强 / 39
黄冈市影视旅游资源开发初探	熊伶俐 / 45
黄冈大别山红色旅游的电视媒体推广研究	张新刚 / 56
新媒体语境下微电影中的旅游城市形象建构	张 倩 / 70
融媒时代黄冈影视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	李艳梅 / 81
新媒体环境下黄冈影视产业发展研究	周萍萍 / 91
黄冈教育题材电影发展策略	金洪申 解立群 / 105
大众传媒对基础教育品牌的构建及传播研究 ——以黄冈中学为例	明 童 / 118

微视频对高校文化品牌传播的作用及其效果	
——基于黄冈师范学院在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	陈 然 / 133
探究区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影视艺术人才培养的创新方法	
——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	孙喜杰 / 142
高校影视艺术课程学生期待视界与接受心理模式研究	
——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	肖 雅 / 151
中国小成本电影突围之道	汪少明 / 158
从横店影视城发展借鉴黄冈影视发展之路	余 为 / 166
消费文化语境下黄梅戏的发展策略	刘砚硕 / 171
记忆中的追寻与希冀	
——基于黄冈本土影视作品的思考	王 灿 / 181
论当前红色微电影的自觉传播与创作路径	杨 丽 / 190
论电影中的语义悖论	黄贤春 / 200
论科幻电影对受众神话心理的满足	方 锐 / 212
由《财神爷赵公明》至《财神到》的叙事伦理转换分析	冯万红 / 221
“小众”与“大众”	
——《圣天门口》从小说到电视剧研究	沈嘉达 / 230
影视观念散论	王佑江 / 246
解读全国市级电视台生存状态	
——以黄冈电视台为例	王同杰 刘月静 / 261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交织	
——谈新版《三国》的与时俱进	黄 丽 / 267
黄冈城市旅游营销研究	
——以旅游微电影《“相约山楂树”——纯爱之城 宜昌》为例	夏 潇 / 273
后 记	/ 283

影视传播与湖北作家的话语选择

张才刚

摘 要：在影视文化的影响下，大量湖北作家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展现了荆楚文学与现代媒介技术的全面融合。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北作家及其文学话语形态发生的变迁，也可以窥见影视作品中荆楚文化的沉淀与表现。在文学与影视互动的背景下审视湖北作家的话语选择，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地解读“读图时代”荆楚文学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也能够为影视艺术的地域风格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找到文学与影视艺术之间难以割舍的本质关联。

关键词：影视传播 湖北作家 荆楚文化 话语选择

荆楚文化滋养与熏陶下的湖北作家，以其积极的“入世情怀”与鲜明的地域特色获得“文学鄂军”的称誉，其话语风格向来就兼具时代性与地域特色。20世纪80年代至今，湖北籍知名作家刘醒龙的《凤凰琴》、池莉的《生活秀》、熊召政的《张居正》、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等大量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展现了荆楚文学与现代媒介技术的全面融合，也使湖北作家别具一格的文学品质与话语风格得以影像化地生动呈现于读者面前。与此同时，更多的新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与网络写手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影像世界，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成功转化成为影视作品。在这一写作心理的推动下，湖北

作家写作的基本面貌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审视与影视媒介同行的这一段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北作家及其文学话语形态发生的变迁，也可以窥见影视作品中荆楚文化的沉淀与表现。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既有内在关联又有着明显差异的地域文化，荆楚文化正与影视等现代媒介艺术一起，塑造着新一代湖北作家，推动着湖北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荆楚文化为本源，在文学与影视互动的背景下审视湖北作家的话语选择，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地解读“读图时代”荆楚文学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探讨湖北作家当下所面临的创作机遇与困境，也能够为影视艺术的地域化风格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从作家到编剧：身份转换带来荆楚文学话语策略的改变

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当代中国作家介入影视文化已经不再是个体的倾向，而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认为：“文学的成功，文学精神的力量，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的推动，也是对全人类精神建设的贡献。因此今天我们探讨了电影的问题，其实文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应该努力的不仅仅是电影，也包括文学自身。”^①学者梁振华则指出，80年代中后期文学与影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并轨”，不仅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影视从荒芜走向喧嚣的一个主要动因，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撼动了此后十余年间中国文学的生存形态^②。这二者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当前许多研究者的观察与判断，由“抵制”走向“并轨”的确为文学与影视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也由此引发了作家与编剧、文学与影视之间话语模式的探讨。从根源上来讲，艺术生产的主体——作家与编剧所处地位的差异，才是我们探讨其话语策略转变的出发点。

从更为宽广的世界范围来看，作家和编剧之间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巨大“鸿沟”。在欧美和我们的近邻日韩，作家和编剧一般是不分开的，因此二者几乎也不存在所谓的“身份转化”难题。反观国内的知名作家群体，始终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单纯依靠图书发行的版税，已经很难使作家们拥有相应的经济收入，“触电”几乎成了他们摆

脱困境的一条捷径；在向影视艺术靠拢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自身身份与世俗眼光的强烈质疑，有违中国传统文人“清高”的姿态。从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不同。早在2008年，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就曾猛烈批判中国文坛出现的“作家写剧本”现象。他认为，不能将剧本等同于文学，因为剧本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中国知名作家严歌苓也承认，长期从事编剧工作的确对写小说有伤害。

事实上，湖北作家之中早就有不少人悄然实现了身份角色的转变，跨文学与影视两个圈子同时兼任作家与编辑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作家在现代媒介语境中是否成功的衡量“指标”之一。湖北本土知名作家中，最受影视制作者青睐的当属池莉。她因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被改编为电视剧而广受瞩目，接下来的另一部中篇《小姐你早》亦是迅速被搬上屏幕；2003年12月，池莉签约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池莉影视工作室”，直接与影视制作接轨。2005年，历史小说《张居正》改编为四十四集电视剧，作者熊召政亲自担任编剧。除此以外，更有许多原本擅长创作小说的作家开始凭借讲故事的优势“转行”写起了剧本。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邓一光就曾创作过多部电视剧剧本。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欣然接受甚至主动追求身份的转变，著名作家刘醒龙在问及“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投笔从编”时，就留下一句话——“决不可能做编剧”。有学者研究认为，不想做编剧的刘醒龙实际上也并没有拒绝其话语形式上与剧本的接近。

在身份转化的外在表现中，我们看到的是话语策略的明显转变。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无论怎么说，每个人社会语言学历史的特异性并非说话人之间差异的唯一根源。我们可以设想这么一个人，他构造了所居住社区的模式（大概，或多或少是处于无意识水平上），这里，他周围的人被安排在某个‘多维空间’之中，也即，根据大量的不同维度和参数表明了彼此之间有关的相似点和差异性。”^③不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从话语体系来看，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处于不同的话语平台之上——亦即赫德森所谓的“多维空间”，话语上的差异性其实是二者区别于对方的最根本的元素。问题在于，一旦

这两种身份合二为一，或者由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转化，必定意味着话语表达策略的显在改变。即便是作者或者编剧们不承认，这一现象本质上也是存在的。在湖北作家之中，被影视制作者看好的往往就是那几个较为固定的人——包括池莉、刘醒龙，他们的作品被改编的频率和比例远高于其他作家，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身份转化推动话语策略转变的基本观点。

二、从赏文到读图：影视改编引发湖北作家文学话语的变迁

从艺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而言，作家作品与影视传播研究，核心议题是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符号形态的不同致使二者在表达方式与传播效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也有了相互转换的可能。美国学者爱德华·茂莱在《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中列举大量英美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分析了戏剧与电影、小说与电影在创作与改编过程中相互关系及成功和失败原因，其论述核心就在于文字与图像符号的表现力。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就已经开始模拟电影技巧的创作，形成了一度颇为流行的海派文风。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作家与影视有了更为宽广的沟通平台，包括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在内的众多文学作者纷纷与影视结缘。据统计，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70%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集，这印证了优秀文学作品与影视艺术之间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大量湖北作家的作品被挖掘出来，改编成为影视剧集。其中，池莉的小说《小姐你早》、《生活秀》、《你以为你是谁》等先后被搬上荧幕，其语言风格和叙事手法受到了读者与观众的双重认同，并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益。有研究者将池莉小说与影视之间的互通性概括为“语言的动作性”、“全方位的叙事视角”、“对画面的强调”等，走近影像似乎成了其语言表现力在现代媒介语境中得以释放的最有力武器。如果从话语选择的角度来看，池莉确实做到了其他作家所无法做到的：她的作品中很少有长篇的心理描写，少见借由人物表达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现象，也没有对背景或者环境精细入微的描摹，取而代之的是动作性极强的语言和篇幅庞大的人物语言；作者习惯于

采用全知全能的全息式的视角，将作品中人物的过往经历、所处现状甚至于内心的想法，都一五一十、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有一种透视与掌控一切的感受；在拒绝对人物心理状态进行细致静态描写的同时，池莉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生活中“色彩”的偏好，甚至不惜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主要任务的装扮，也就有了《小姐你早》中对王自力的描写：“王自力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黑西服两边分开掖在屁股上，微腆的肚皮突出着白色的衬衣和深色的领带。在威润物面前无奈晃动的王自力像一只委屈的企鹅。”^④如此种种，展示了池莉文学语言上的独特个性，却也能够十分明显地窥见其为影视剧改编所做的准备，我们也可以视之为影视媒介传播影响下的一种写作姿态与创作理念。

在湖北作家群体中，池莉的经历并不是特例。在受邀担任《汉正街》的编剧以后，著名作家董宏猷于2004年12月策划成立了一个“视听创作委员会”，力图搭建起一个影视资源整合的互动平台，打造“汉军影视创作群体”，推动文学与影视产业化链条的形成。同样，有研究者认为刘醒龙的文学影响力甚至创造力，既与自身的文学修养及其风格有关，也离不开影视媒介的推动。在其作品《圣天门口》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后，刘醒龙本人对两种艺术形式在符号形态上的优劣做了一个比较：“影视作品对小说改编的不足，是先天的。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影视作品无法达到小说所能想象的高度、深度与宽度。影视作品也有其所长，其直观性、简明和通俗，是其无法替代的优势。”^⑤基于这一理解，刘醒龙一方面鼓励“文学作品要大胆进入影视剧”，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定要对原著高度尊重，不要胡编乱改”。在他看来，就文本叙事的能力与效果而言，文学作品远在影视作品之上；唯有充分吸收文学艺术的营养，才能使影视作品更具思想深度性。

对湖北作家的以上论述，也可以延伸至中国当代其他知名作家之中。王朔、海岩、刘震云、苏童、刘恒、莫言等人，同样因为文学语言与影像符号的交叉融合而受到关注。其中，刘震云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位，作品《手机》、《一地鸡毛》以及《温故1942》均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其“电影化”的写作风格也饱受争议，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蒙太奇手法”和“小说的空间化”。海岩也被列入典型的“影视化作家”行列，其作品几乎都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了电影电视并取得了相